

中国国际 战略评论

2012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 崔天凯 庞含兆 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
- 袁 明 国际关系中的新人文景观
- 肖天亮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国际安全合作
- 朱 锋 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
- 李侃如 美国的亚洲战略
- 秋山昌广 日本的海洋战略
- 全在晟 变化中的中美关系与韩国外交战略

中国国际 战略评论 2012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 / 王缉思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12-4301-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2012 ②对外政策—研究—中国—2012 IV. ①D5 ②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4867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马莉娜
小 月

书 名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

Zhongguo Guoji Zhanlue Pinglun 2012

主 编

王缉思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 (直销) 010-65265923 (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2½印张

字 数

4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01-3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自2008年创刊以来，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跟踪、分析、评论了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评论》第五期即将付梓之时，回眸一下近年来的国际形势新发展，感慨良多。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无异于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日两大经济政治实体，皆处于信心不足、前景欠佳的状态。多年前常常听到的“日本崛起”，不久前还耳熟能详的“欧盟崛起”，都已经被公众忘在脑后。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其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恐怖组织策划的血腥爆炸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少，被西方视为宿敌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家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争斗愈演愈烈，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扩大，以色列内外环境趋于紧张，均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担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恶化之时，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却不得不逐步撤出该地区。一般舆论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连锁反应，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忧多于喜，从整体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

与此同时，“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壮大，成为新兴国家中最突出的亮点。在未

来10年里，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拉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观察家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从而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有人把上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称为“东升西降”。就此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本期《评论》刊登的几篇相关研究报告来看，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在感觉上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我们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同时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确实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西方大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乐见其成，而新兴大国对西方经济低迷也不可能幸灾乐祸。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印度经济形势不佳，也同外部环境的消极因素增加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综合来看，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第二，国内战略评论家所做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人口发展速度接近于零或低于零，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和发展中大国的低福利、低消费等因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明显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当然，在这些挑战中也蕴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机遇。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造成了冲击，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进行的协调，也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

当大的差距，而且有些差距还有扩大的迹象。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其中有的国家甚至就是某些纷争的当事国。因此，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这里说的“安全困境”，主要是指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同时相互协调对华战略，进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想法不但反映在大众媒体上，也反映在专家学者的战略分析中。但是，中国的“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第五，中国在外部世界表现的强势，在一定程度被中国国内某些消极因素所抵消。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差强人意，并未因海外影响的拓展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的归纳和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

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的边界、主题、主线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能够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起到什么样的咨询作用？我们编辑出版的五部年度《评论》虽然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专门的解答，但是它所涉及论题的多样性，文章作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应当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深化我们的战略思考。

除了中国大陆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贡献的15篇评论以外，本年度的《评论》还汇集了另外8个国家的战略评论家的14篇文章，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两篇文章。编者并不刻意追求境外作者在《评论》作者中所占的比例，而是以稿件的水准为优先考虑。借此机会，我们对几年来为《评论》作出贡献的诸多作者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决心让《评论》保持其多姿多彩，质量逐年提高。

王缉思

2012年5月

目 录

特 稿

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崔天凯 庞含兆

1

专 题

*** 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

朱 锋

9

*** 美国的亚洲战略**

[美]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23

*** 亚太秩序的变化与日本的战略**

[日] 佐桥亮

33

*** 变化中的中美关系与韩国外交战略**

[韩] 全在晟

45

*** 美国“转向”亚洲：对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

[印] 郑嘉宾

62

* 适应美国的“转向”与发展澳中关系	73
[澳] 威廉·陶 (William Tow)	
* 俄罗斯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评价	83
[俄] 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 (В.Я.Портяков)	
* 缺席的促稳者? 欧洲与东亚安全	91
[英] 潘睿凡 (Raffaello Pantucci)	
 国际关系中的新人文景观	99
袁 明	
 当前和未来五年我国在国际安全上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104
江凌飞	
 南海问题: 现实与挑战	117
吴士存	
 马英九就职演说之内容分析: 挑战与展望	126
袁 易	
 当前两岸关系下台湾“国际空间”的机会探讨	132
刘复国	
 朝鲜半岛问题与中美博弈	140
金强一	
 重回十字路口的中俄关系	157
[俄] 谢尔盖·拉钦科 (Sergey Radchenko)	
 非洲兴起的内生动力及中非国际合作新思路	171
刘海方	

论中国在苏丹的利益及其维护	184
胡菁菁	
推进社会变革的“占领华尔街”：趋势、影响与对策	195
[美] 妮拉·坦顿 (Neera Tanden)	
“3·11”之后的日本政局变化	206
张 勇	
撤军、和谈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	214
钱雪梅	
西亚北非乱局与西方的“新干涉主义”	228
安惠侯	
面对不确定：对阿拉伯起义的批判性评鉴	237
[伊拉克] 龙纳诚	
2011年哈萨克斯坦局势——不安的一年	251
杨 恕	
影响拉美国际地位的若干因素	261
江时学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国际安全合作	272
肖天亮	
关于国防动员问题的若干思考	281
欧阳维	

中国航母海试：“起步航母”与中国海上力量的未来	289
[美] 安德鲁·埃里克森 亚伯拉罕·登马克 加布里埃尔·柯林斯	
试析中美核不扩散合作	303
[美] 司乐如 (Lora Saalman)	
日本的海洋战略	319
[日] 秋山昌广	
《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之后的英国战略	332
[英] 杰弗里·蒂尔 (Geoffrey Till)	

特 稿

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

——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崔天凯 庞含兆

在中国的外交全局中，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占有特殊重要位置。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重点之一。

中国的对美政策在目标上与国家对外战略相一致。如果说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一个总体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核心目标，那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要求。如果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领导集体、执政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的战略抉择，那么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国致力于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道路的政治意愿是清晰和明确的。胡锦涛主席在今年5月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阐明了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途径”。习近平副主席2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戴秉国国务委员同美方多轮战略对话的中心议题始终是中美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型关系，而且，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一主线越来越鲜明和

崔天凯 外交部副部长；庞含兆 外交部美大司一秘。

突出。

中方的战略姿态和政治信号已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呼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中正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共同寻找“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早在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开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之时就已起步。这种努力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3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若干年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

当前，国际格局、世界经济、人类社会都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中国要坚持既定方向，秉持和平、合作理念，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来；中美要打破所谓历史宿命，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路来；世界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潮流，走出一条多元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路来。中美关系走势对这三方面的摸索实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关乎两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二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3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再悲观的人也需要承认，双方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些决定了，双方确立一个更加稳定、可靠的良性互动架构，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可能和可行的。

第一，两国已经认识到，合作共赢是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战略共识，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认识的升华，为双方在未来交往中形成更高层面的战略共识或者默契提供了基础。中美都是自信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已在公开政策宣示和内部战略沟通中相互表明，对对方没有领土要求，因此也就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中美均承认一个现实，两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以往，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两国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对方，在国际事务中也都需要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合作。在新的时期两国要全力避免重蹈传统大国恶性竞争的覆辙，全力避免双边关系走向双输。这不是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的必然选择。

第二，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丰富、完备，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2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副主席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分别任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刘延东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分别任双方主席）、商贸联委会（王岐山副总理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对话）、科技联委会等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元首、外长热线，王岐山副总理也与盖特纳财长经常通话。戴秉国国务委员与克林顿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小范围会晤迄已分别举行5次和3次，每次时长都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官式会谈。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但两军关系不时受到美售台武器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部分对话交流一度中断，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梁光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只要美方切实消除对台军售、迪莱修正案等长期制约两军关系的障碍，两军关系就可以顺利发展，为推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更重要贡献。

第三，两国荣损与共的利益交融格局无法打破、不可逆转，还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也获得了丰厚回报。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1年已达4466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182倍，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至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至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2001至2010年间，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

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多个领域。

第四,民间交往成为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的源源不竭动力。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曾在人类反法西斯战线上相互支持,“飞虎队”这样的往事至今在两国国内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盖洛普网站2月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4月民调显示,近八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现在,每天有9000人、每周约200架次客运航班、每年有300多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中美已建立起友好省州关系38对,姐妹城市176对。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顺应了民意。

第五,不断扩大、深化国际协调合作是双方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助力。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40年前,中美重启两国交往大门就是两国领导人从全球视野审视与对方关系的结果。现在,两国关系的影响更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全球内涵越来越深。双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中美之间也已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两国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对解决所有问题都必不可少。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中美不要搞“G2”(两国集团),但应该搞“C2”(两国协调)。

三

中美走顺共建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需要破解五大难题:

(一)战略互信缺失。人无信不立,国家之间亦然。中美不能说没有互信,但互信不足也是客观事实。中美是两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各自深植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信仰、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坚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彼此战略意图的判断如果“失之毫厘”,后果很可能将“差之千里”。基辛格认为,中美如策略失当,长远成本可能比一场战争还要大。无论是管理双边交往,还是应对全球和地区共同课题,无论是出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要求,还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

待，增进中美互信越来越迫切。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大国不等于强国，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属性并没有变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本质上是内敛型而非扩张型，是和平型而非暴力型。

中方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更无意与美国争夺霸权。想当然认为中国想要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同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方面，美国的选择至关重要。

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一些将美国面临的问题归罪到中国头上的苗头，对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不是本着“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去解决，而是无限上纲上线，动辄用大国争霸的尺子去衡量，从最坏处臆测和分析中方的意图。在“重返”亚太过程中，美大力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插手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分歧等，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想借此向中国和地区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不仅中方有疑问，地区国家也感到不安。如何让中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表述与真实意图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核心利益瓶颈。中美互为利益攸关方，双方利益的交集在增多而不是减少，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也是为维护好自己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创造必要条件和气氛。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但美国在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难令中方满意。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邓小平曾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只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历史证明，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遇到波折甚至重大冲击。

美方公开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但“八·一七公报”发表30年后的今天，美仍然在对台售武。那种认为将两岸分隔现状无限期延续下去对美有利的看法显然误判了两岸形势，摆错了台湾问题在美对华关系中的位置。在中美利益互融度日益深化之际，打台湾牌是负收益而非正资产，满足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受损的是更大范围的中美关系，使美陷入更大战略被动。邓小平还说过，“坦率地说，美国这样做（对台售武），并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不起的威胁，但是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制造了障碍”。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无限期地对台出售武器，又想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是不现实的。

恪守在“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更加明确地遏独而不是阻统，以实际行动显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为促进台海局势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如

果美方放弃不合时宜的思维，台湾问题是可以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的。

美方承认，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以伙伴关系精神处理有关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但美方在涉藏、涉疆、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时常公开指责中方，甚至发生公开插手中国内政的事情。显然，美国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在一个多人口、多民族的国家里，找到不满声音并不难，但如将此视为搞“颜色革命”的机遇，就犯下重大战略错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希望在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推进各项改革，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和平演变”在中美力量对比悬殊时没有成功，现在和将来就更加渺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背后的小动作越少，越有利于双方将更多精力放到那些真正有利于实现中美互利双赢的合作上来，对双方、对世界就越有利，对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就越有利。

（三）真正践行平等相待。这是民主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中美发展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谁求谁、谁欠谁、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双方基于维护共同的现实和长远战略利益所做出的选择。邓小平曾说过，“就中美角度讲，我听到一些美国人说，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就不会考虑与美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世界上的挑战。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平等不等于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搞“共治”或者“分治”，而是要从心态上、行为上真正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对话合作伙伴，多些换位思考，对等照顾到对方关切，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而不是自视高人一等，并且任意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修改规则。

中美不可能变成对方，两国对外战略目标并非一致，外交理念和手段存在差异，这很正常，并不表明双方不能实现双赢。事实上，中美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正在逐渐增多，在网络等国际新空域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空间。实践证明，只要双方真正秉持平等原则，就可以找到利益汇合点，实现互利合作。相反，如果为了一己之利而单向施压，甚至公开指责对方是“有选择的利益攸关方”，“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威胁组建“国际统一阵线”逼对方就范，非但于事无补，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气氛。中方一贯主张要以建设性的、照顾双方舒适度的方式来解决，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决不含糊。

（四）贸易结构重组。中美存在经贸摩擦，事实上是中美利益互融加深的体现，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不断成熟过程中找到解决方法的。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更不能根据自己的内政议程强推所谓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中国是个拥有13亿多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未来五年内将创造10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很多与中国经贸联系密切的国家从中国五年发展规划中看到了所蕴涵的巨大合作潜力，越来越重视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相